

“改革开放口述史丛书”编委会
主任 曲青山

山西 改革开放 口述史

张志仁 巨文辉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改革开放口述史丛书”编委会

主任 曲青山

山西改革开放口述史

张志仁 巨文辉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西改革开放口述史 / 张志仁, 巨文辉主编. --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9.2

(改革开放口述史丛书)

ISBN 978-7-5098-4973-6

I . ①山… II . ①张… ②巨… III . ①改革开放—历史—山西 IV . ① D61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1685 号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鸽子

复 审: 吴江

终 审: 汪晓军

责任校对: 龚秀华

责任印制: 段文超

责任监制: 贺冬英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 100080

网 址: www.dscb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字 数: 354 千字

印 张: 24

印 数: 1—2050 册

版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4973-6

定 价: 53.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 010-82517197

“改革开放口述史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曲青山

编委会副主任 吴德刚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刘荣刚 刘晓晨 苏红军 杨建伟 张志仁

胡庆国 徐塞声 高新民 程中才

《山西改革开放口述史》

主编 张志仁 巨文辉

副主编 苗长青 刘一丁

目 录

- 主持山西省委工作期间的若干回忆 李立功 / 1
- 山西工作若干施政举措的回顾 王茂林 / 50
- 回忆我在山西当省长 王森浩 / 64
- 关于太原改革开放的几点回忆 孙 英 / 71
- 在山西工作的若干回忆 张维庆 / 87
-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太原 王云龙 / 117
- 太原世纪之交的改革与发展 纪馨芳 / 132
- 在太原工作期间的回忆 云公民 / 143
- 太原市推动工作重点转移的回忆 王绣锦 / 154
- 我所经历的山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 霍 泛 / 161
- 回顾在山西省改革开放前期我亲历的几项工作 吴达才 / 180
- 在太原市政府工作的回顾 万良适 / 200
- 知天命迎来改革开放 李玉明 / 207
- 改革开放初期山西财政改革的回顾 闫元锁 / 216
- 难忘阳泉、长治的改革开放 光 敏 / 241
- 20世纪90年代吕梁的改革引起全国关注 姚新章 / 258

- 担任晋城市长和市委书记的回忆 薛荣哲 / 261
- 古交市、晋城市改革开放二三事 李雁红 / 269
- 回忆我任太原市长的岁月 杨崇春 / 280
- 新兴城市朔州的诞生 阎赞尧 / 293
- 我亲历的大同市若干改革事件 孙辅智 / 302
- 我所经历的榆次改革开放 冀安信 / 316
- 我所经历忻州改革的那些事 于崇良 / 329
- 我所经历的山西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李砚林 / 338
- 回忆雁北企业人事制度改革 王作柱 / 348
- 运城农业改革开放情况 韩文轩 / 353
- 孝义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情况 张忠亮 / 358
- 太钢十年治渣的回忆 李双良 / 370
- 后记 / 377

主持山西省委工作期间的若干回忆

李立功

1981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中组部部长宋任穷、中央书记处书记万里先后找我谈话，提出要我回山西工作。

当时，我对到山西工作有顾虑，并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我说：感谢中央对我的信任，但山西在“文化大革命”中很乱，我是山西人，在山西有不少熟人，回山西恐怕不好办。胡耀邦同志对我说：找来找去还是你去山西合适，因为你对山西熟悉，“文化大革命”中又不在山西，不论这一派那一派，你都没有介入，好处理问题。他还说：霍士廉、罗贵波同志年龄都大了，你身强力壮，对山西熟悉，了解情况容易，你去比较合适。他还让我再找宋任穷、万里同志谈一谈。宋任穷、万里与我谈话的内容同胡耀邦谈话的精神一样，并明确告诉我回到山西之后任省委常务书记，霍士廉任第一书记，罗贵波任第二书记，要我支持他们的工作。还嘱咐要我回去之后，先抓一下落实政策的工作。中央的信任和支持，对我是很大的鼓励，消除了我的顾虑，我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回到山西后努力工作。1981年5月21日，中央决定任命我为省委常务书记。1983年3月，中央又决定我接替霍士廉同志，任省委书记（不再设第一书记）。1991年3月5日，王茂林同志当选为山西省委书记，我改任省顾委主任。

消除派性为改革开放清障

（一）消除派性，重中之重

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要求，首要的任务是尽快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我回山西之前，霍士廉、罗贵波等领导同志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山西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完全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等项工作也遇到了不少阻力。这阻力不是别的，主要是派性在作怪。我回山西后的第一个突出感觉，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遗风、派性十分顽固。不仅群众中的派性仍然存在，就是在省委和一些地、市委的领导班子中，也有一些人受派性影响很深。特别是在研究落实政策、清查善终、平反冤假错案、人事安排等关于人的问题时，对立的情绪很快就冒出来了，各有各的是非标准，各有各的一套理论，简直是水火不能相容。而领导班子内的这种分歧和对立，与省直机关及各地、市都有联系，上边一开会，下边马上就知道了详细情况，随之引起了下边的分歧和对立。1981年8月13日到17日，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来山西视察工作，他在省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重要讲话，严厉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山西干部队伍中当前存在着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团结不够亲密，不够坚强。换句话说，疙瘩还相当多、相当大、相当紧。”针对这种情况，胡耀邦同志特别强调，凡是把自己的同志批错了、斗错了、定性错了，都要迅速加以解决，该平反的平反，该纠正的纠正；凡是被斗错了的同志，不能赌气，不能凭意气办事；改变了工作岗位的同志，应当高高兴兴到基层补课，不能跟组织顶牛，任何一个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无条件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有明确的立场；新老干部要加强团结，亲密合作。我意识到，山西的这种情况不改变，不消除派性，不加强团结，什么事情也干不好。消除派性、增强团结，是山西工作重心转移的当务之急。

山西的派性斗争，从根本上来讲，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特殊的政治斗争的产物，它首先是中央文革小组康生、江青和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制造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江青、陈伯达等多次直接插手山西，使山西两派的斗争屡禁不止。从实质上讲，突出地表现在对权力的争夺上。“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江青就支持省委、省人委领导班子中的几个人夺山西省委、省人委的权；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又今天点这个人的名，明天点那个人的名，利用造反组织相互争斗，肆意制造混乱。而群众组织中的一些派性头头，又在领导班子中寻找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又反过来利用造反派保护自己、扩充势力，从而形成了从领导干部到群众中的势不两立的两大派。而且这种派性斗争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反复的次数比较多，所以疙瘩越结越多、越结越大、越结越紧。据我回到山西后的观察，省委领导班子中，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仍在或明或暗地表现出来，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干部的认识和使用上。受派性影响严重的一些领导同志，对干部的观察，往往漠视客观事实，不顾党的德才兼备、公道正派、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以派性标准代替一切。

由此，我深深感到必须坚决消除派性，增强团结，这个问题不解决，山西的工作重心要想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是相当困难的。所以，我把消除派性、增强团结、保证社会安定，作为山西改革开放的“前期工程”来看待。

（二）着力摆脱派性对领导班子的干扰

我刚到山西时，两派斗争尚未彻底解决。当时，我有一个好主意，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尽量超脱，绝不能卷入两派斗争之中去。我认为，山西的广大干部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不少人陷入了派性，但多数人本质上是好的。闹派性闹得最凶的，少数人是利用派性浑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多数人还是在打派仗中昏了头脑，迷了心窍，他们经过教育是可以清醒过来的。所以，他们不管是支持这个领导同志的，还是支持那个领导同志的，也不

管是省级领导干部，还是一般干部和群众，我耐心听他们的不同意见，但都不马上表态，而是听了之后经过仔细分析，进行调查研究，对于正确的意见予以采纳，对于不正确的意见则坚持原则，不随波逐流。特别是1983年3月我担任山西省委书记之后，可以说是站到了风口浪尖上。说实话，如果当时我或明或暗地站在对立两派中的任何一边，我可能会受到某一部分人死心塌地的拥护，但同时又会遭到另一部分人的坚决反对。那样的话，山西的形势将会重蹈过去混乱的覆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在山西就难以顺利贯彻执行。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消除派性、增强团结的关键，在于摆脱派性对领导班子的干扰。如果省委领导班子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能够协同一致地站在党的立场上，从党性原则出发，摒弃派性的干扰，那么消除派性、增强团结的工作便能见到成效。否则，消除派性、增强团结的工作很难进行下去。当时，省委常委在研究经济工作和生产问题时，还能够坐下来共同商讨，但遇到某些敏感性问题时，派性的影响就发作了。

于是，中央决定由王森浩到山西担任省长。同时，对于其他同志，也作了适当安排。另外，我们对一些老同志的工作安排，也作了慎重处理，有的安排为省委常委、有的安排到省政协当主席或副主席，对其中一些当时安排不甚妥当、本人意见较大的同志，过后又作了一些微调，安排了更为合适的工作，使他们逐步消了气、顺了心。说实话，山西是革命老区，那些老同志的入党早、资历深，但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矛盾，对他们的意见既不能不听，也不能全听；对他们的要求既不能拒绝考虑，也不能唯命是从，既硬不得，也软不得，只能慢慢地做工作，沟通思想，化解矛盾。通过工作，省委领导班子的思想逐步统一了，这对稳定山西形势、保持山西社会安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活血化瘀”解“疙瘩”

如何消除派性、增强团结，我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山西绝对不能再折腾了。山西在“文化大革命”中折腾了好多次，留下了很难解决

的后遗症。当时，我考虑要尽量在思想上解“疙瘩”，不能轻易地、简单地采取组织措施，不能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而是要像医生治病一样，多做“活血化瘀”“舒肝理气”的工作。就是说，要从思想教育着手，引导干部和群众认识派性的危害性和团结的重要性，自觉地和派性决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省委组织大家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用小平同志“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遗风，坚决反对站在派性立场上争输赢、争高低的思想。当时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召开各种会议、开办学习班和健全党的组织生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共产党员的党性标准检查自己、认识自己、教育自己，要求做到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那时学习和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非常有利于解决这些问题。在学习中一一对照检查，那种“唯我独尊”“唯我独革”的派性顽症和“文革遗风”便原形毕露。同时，在学习的过程中，引导党员干部要看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不能老是盯着别人专找毛病。我在省委工作会议和全委扩大会议上，曾经多次讲解“疙瘩”、讲团结的问题，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以大局为重、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要计较个人的私利；告诫大家要认识到在“文化大革命”的多次折腾中，不少人自己既挨过整，也整过人，同志之间不管有多大分歧、多大隔阂，总是内部矛盾；过去的事情已经成为历史，要宜粗不宜细，只要在原则上分清是非就行了，不要再纠缠枝节，不要总是追究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要讲大局、讲谅解、讲宽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我引用了鲁迅先生那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名言，多次强调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要在解“疙瘩”、讲团结方面作表率，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作领路人，作顾大局、讲团结的模范。我的这些意见，大多数干部是认同的。当然这种思想工作不是一两次可以见效的，经过不断地学习与反思，相互之间的隔阂才逐渐消除，思想才慢慢沟通，逐渐达到多数人能够站在党的立场上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

除了在思想上进行教育之外，消除派性、增强团结的关键，还在于

能够在处理人的问题上认认真真地按党的政策办事。如果不能认认真真地、不走样地按党的政策办事，就会给派性的发作造成口实，提供机会，解开的“疙瘩”又可能重新结起来。当时在处理人的问题上敏感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落实党的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二是清查善终工作；三是安排使用干部。在落实平反冤假错案政策方面，对于历史上冤假错案的平反纠正，问题不大，而对“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冤假错案的平反纠正工作处理不好，派性就容易发作。好在经过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复教育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各种案件都有了新的认识、新的看法，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政策为准绳，尽管也会遇到派性的某些干扰，但在事实面前谁也无法反对，所以基本上也都进行了平反纠正。

关于清查善终工作，遇到的麻烦就比较多。1979年，开始清查善终工作，1981年上半年基本结束。在清查善终工作中，对清查工作中发生的清查错了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纠正，于是有的人就说清查“扩大化”了；但在后期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对一些不该平反的人也平了反，又有的人说善终是“一风吹”了。由于两种不同认识的对立，清查善终工作基本结束后，在一些单位和一部分人中间，被清查的人有一股怨气，搞清查的人也感到委屈，互不服气，貌合神离。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后来我们在整党中核查“三种人”时，反复强调各级领导同志要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坚持一个政策、一个标准，即坚持中央的政策和标准，不许另搞一套，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制定的“既要坚定、又要慎重，既不要漏掉、又不要扩大化”的方针，以严肃审慎的态度，抓住清除混入领导班子、要害部门和第三梯队中的“三种人”这个重点，进行了扎扎实实的工作。我明确提出，不管是哪一派的，也不管是搞清查的还是被清查的；也不管“文化大革命”中是保过自己的还是反对过自己的；也不管是跟自己亲近的还是跟自己疏远的，只要是“三种人”，都要毫无例外地加以清理。可以说，核查“三种人”的成果，是善终工作的继续和完满结束。由此，避免了派性的干扰，对消除派性、增强团结起了重要作用。

在干部使用方面，也有个化解矛盾、维护安定的问题。在这方面，

我们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牢牢掌握党的干部政策。我当时考虑，如果在使用干部问题上不能坚持党性原则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不能排除派性的干扰，那就会引起矛盾，形成分裂，挫伤干部的积极性。

总之，运用一切办法化解矛盾，增强干部和群众的团结，稳定山西的局势，这是把山西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关键，而解决问题又只能是逐步地、慢慢地做工作。也就是说，不能采取过激的办法，只能采取“活血化瘀”“舒肝理气”、化解矛盾的办法。实践证明，这种办法是很有成效的。

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一）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政治上拨乱反正的进行和对“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的纠正，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在全国涌动。首当其冲的是农村改革的兴起，突破口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山西也不例外。

我回山西之前，省委已经在推动农村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经济改革的一个切入点。这一改革，是广大农民群众在农村拨乱反正中的创造。“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发生的“左”的错误的的影响，搞所谓“大批促大干”，即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使农村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生产经营管理办法被否定，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粉碎“四人帮”之后，我还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全国许多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自动地起来纠正学大寨运动中那一套“左”的错误做法，千方百计地寻求发展农业生产的新办法已有所闻，曾参加过北京市委对郊区一些山区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的研究。特别是1978年4月北京市委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以后，各县区根据会议的

要求，开始实行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超产奖励的办法。在山西，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特别是实行包产到户，开始有许多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一时转不过来，赶不上去。尤其是过去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典型的社、队，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更是一时转不过来，赶不上去。当时，我分析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起初一些农村在实行生产责任制时，由于缺乏指导，没有经验，曾经出现过一些问题。如某些生产工具包括集体的农业机具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集体的牲畜被无偿地瓜分，集体的房产被遗弃，某些小型水利设施被闲置，一些社员欠集体的款项被一笔勾销，等等，遭到了部分群众的怀疑和不满。所以当时曾经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二是在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从干部到群众有思想障碍，主要是几十年农业集体经营传统模式的影响，以及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左”的思想影响没有得到清除，他们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混为一谈，认为过去的集体经营是社会主义，实行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唯恐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

在霍士廉、罗贵波的主持下，省委许多常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对在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的问题进行了一番考察，省委常委会又反复讨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召开各种会议，如省委常委会议、县委书记会议、工作会议、电话会议、山区工作会议等，由这些领导同志讲解中央的精神，传达省委的意见，以进一步解放各级干部的思想，统一各级干部的认识。并且从全省各地、县和公社抽调了四万多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像搞土地改革和搞合作化时那样，深入到农村，帮助社、队干部扎扎实实地完善生产责任制。各县还以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为内容，对农村基层干部主要是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和会计，普遍进行了一次培训。培训由各县县委主办，县委书记亲自领导，组织学习中央有关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文件，领会精神实质，联系当地的实际，从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中，深刻认识“左”的思想在指导农业生产中的危害和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另外，还组织报社、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单位的记者到农村采访，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党中央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政策和典型事例与经验，进行舆论引导。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山西也和全国各地一样，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开始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到1981年春，全省掀起了以建立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高潮。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后，省委又先后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和省委工作会议，专门研究了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由霍泛和王庭栋分别作了讲话。10月，我受省委委托，主持召开了全省电话会议，霍泛又就农业生产责任制建立的情况和应注意解决的10个问题作了讲话。其中特别对一些地方私分集体财产的现象作了分析，提出了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结合的原则。这些对在山西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83年5月，我和霍士廉联名在《红旗》杂志发表了《推进改革，全面振兴农村经济》的文章，重点介绍了雁北地区从实际出发，建立、稳定和完善的农村承包责任制的情况。

经过两年的努力，到1983年底，全省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占到生产队总数的99.4%。

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使农业生产基本上由统一领导、集体经营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纠正了过去群众所说的那种“七斗八斗伤了心，平均主义懒了人，单一经济受了穷，财务不清黑窟窿”的现象。在产品生产上，生产队只对国家征购部分向承包户提出要求并必须完成，其余部分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农民自己决定。在产品分配上，农民要完成国家征购的任务，交够生产队的提留，其余产品归个人所有。也就是安徽群众所说的“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把农民的责、权、利紧密地结合起来，不仅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等弊病，而且纠正了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单一等缺点，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

据统计部门的统计，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1975年至1977年全省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减1.5%；1978年至1980年每年平均递增率达到3.2%；而1981年至1985年每年平均递增率则高达7.8%。

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由于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大解放，在生产经营方面出现了许许多多成效显著的创造，促进了多种经营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工分业，为农村经济向专业化、社会化过渡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二）支持和保护“两户”发展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稳定和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广大农村原来由集体统一经营和管理的畜牧业、林业、水利设施、大中型农业机械及工副业生产项目，也都逐步实行了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向“包”的经营方向发展，出现了一些专业户、重点户。我们把这种专业户、重点户称为劳动致富户。这些专业户、重点户有的是承包集体的农、林、牧、副业，其形式有以户承包、以组承包、个人承包等几种；有的是发展家庭副业。但是，当时在农村中仍然有一些群众存在着“怕变”的顾虑、一些干部仍然存在着“怕右”的思想。他们的脑子里仍然有一些不正确的认识，认为只有集体劳动才是社会主义，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独立劳动是资本主义；“吃大锅饭”的“统”是社会主义，“包”“放”“活”都是资本主义。特别是有些专业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学大寨运动中曾被割过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受过批判。他们虽然走上了专业化生产的道路，但心里并不踏实，还有不少担心和顾虑，富了怕露富、富了不敢再富，可以说是战战兢兢地前进。

为了解决这些思想问题，省委于1983年初专门召开了一次山区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除了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之外，还吸收山区建设先进集体的代表和先进个人参加，参加会议的大约在2400人左右。在这次会议上，王庭栋代表省委作了关于山区建设的报告，我作了《努力开创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的讲话。霍士廉、罗贵波也分别作了讲话。我在讲话中根据农村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实际，指出专业户、重点户的发展，体现了党中央倡导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是发展商品生产，走专业化、社会化道路的带头人。他们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即使合理雇请一些技工、帮工、专业工或带一些徒弟，

也是允许的，是农村商品生产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不论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把他们打成“暴发户”“新富农”。我还指出，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专业户富得过头了，而是富得还不够，离小康目标还差得很远；其他人不应该嫉妒专业户、眼红专业户，而应当向他们学习，并在他们的带动下，共同走上富裕的道路。我特别强调，在农村要造成劳动致富光荣，走专业化、社会化道路光荣的热烈氛围。

1983年7月，省政府发出《关于支持和保护“两户”发展若干问题的通知》，具体规定了支持和保护“两户”发展的十三条政策性措施。各级党委和政府按照这十三条政策性措施，进一步大力帮助“两户”的发展。11月，省委和省政府又发出抓好培训“两户”的通知。各地根据通知的精神，狠抓了“两户”的培训工作，这对提高“两户”的政策水平和科技水平，起了重要作用。

1984年初，省委召开了一次农村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传达学习了1984年中央1号文件和万里同志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听取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同志的讲话和安徽省滁县地委、河北省蠡县县委、河南省武陟县委的同志关于农村工作经验的介绍，又一次就发展农村经济的认识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地（市）、县委书记，要领导好农村工作和农村经济，首要的问题是重新认识转变中的农村经济，适应两个“转化”的新形势，即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着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着现代化农业转化，在思想上、领导素质上和工作作风、工作方法上力求尽快适应。会上提出1984年农村工作总的设想是：在继续巩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围绕着发展商品生产，力争在三个方面有较大的突破：一是在发展多种经营、农村工业尤其是农副产品加工业上有较大的突破；二是在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服务上（包括技术、资金、供销、储藏、加工、运输、市场信息、经营辅导等方面的服务上）有较大的突破；三是在改革农村商业体制、疏通流通渠道上有较大的突破。我认为，这是在农村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商品生产总题目下互相关联的三篇文章。只有把这三篇文章做好，才能打开农村商品生产的新局面。而做好这三篇文章的基础是稳定和完善的